

教学相长
德才并美
叶圣陶题

大 师

铸就的春晖

DASHI
ZHUJIU DE
CHUNHUI

——1920年代的春晖中学

李兴洲◆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大 師

铸就的

春晖

DASHI
ZHUJIAN
CHUNHUI

——1920年代的春晖中学

李兴洲◆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孙兴民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伍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师铸就的春晖——1920年代的春晖中学/李兴洲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01-007368-2

I. 大… II. 李… III. 春晖中学—校史 IV. G639.2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1881 号

大师铸就的春晖

DASHI ZHUJIAU DE CHUNHUI

——1920年代的春晖中学

李兴洲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38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7368-2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教育的信仰(代序)

兴洲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大师铸就的春晖——1920年代的春晖中学》，经过充实完善，马上就要问世了，他让我写几句话。我也确实想说点儿什么，不只为两年来自然、愉快、相得益彰的合作研究生活，更是为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教育，为她正在超越知识、技术而走向追求文化和教育精神的新时代。

百余年来，为了富国强兵，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教育，不能不从最紧迫而直接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规划和发展。于是，教育处在国家和个人功利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功利主义教育观深入人心，契合教育本义、以宗教家的情怀思考教育问题、从事教育活动，似乎成了一件迂阔不实之事。然而，就是在这种大气候里，仍然有那么一批有信仰的教育家，以他们的执著追求，让教育的真精神闪耀在历史的夜空。

1920年代前期的春晖，就聚集了这样一批有信仰的教育家——夏丏尊、朱自清、匡互生、丰子恺……对纯正的、充满爱的教育的共同追求，把他们聚集在一起，造就了辉煌的春晖——“北有南开，南有春晖”。

正好手头有《朱自清全集》，便顺着兴洲君的指点，读了其中的几篇文章。先是《教育的信仰》。文章以种种事例，批陈了功利化教育中教育者的种种形象。一种是：

“校长教师们既将教育看作权势和金钱的阶梯；学生们

自然也将教育看作取得资格的阶梯；于是彼此都披了‘教育’的皮，在变自己的戏法。戏法变得无论巧妙与笨拙，教育的价值却已丝毫不存！”

此类教育者固不足言教育，那些号称贤明的校长教师，也不脱功利化窠臼：

“他们心目中的教育，可以三语括之：课功，任法，尚严。课功是指注重事功而言。如设备求其完善，学业成绩求其优良，毕业生愿长学与能升学（能考入大学专门）的，求其多，体育成绩于求优良之外，更求其能胜人；都是所谓课功。事功昭著于社会，教育者之责便已尽了。因为要课功，便须讲求效率，便不得不有种种法则以督促之。法则本身是没有的，于是必假之以权威。权威有鞭策之功；于是愈用愈爱用，而法则便成了迷信了！在任权信法的环境中，尚严是当然的。因为尚严，所以要求整齐划一；无论求学行事，无论大小，差不多都有一个定格，让学生们钻了进去。”

朱自清最后说：

“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

我斥责那班以教育为手段的人！我劝勉那班以教育为功利的人！我愿我们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仰的人。”

不要以为“以教育为信仰”只是朱先生的口头宣言。他既是朱先生人格的自然流露，也是春晖那班为教育理想而奋斗的人们的实践写照。当时实际主持校务的是夏丏尊。在《教育家的夏丏尊》中，朱自清这样描述“丐翁”（这是朱对夏的尊称加昵称）：

“夏先生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他跟李叔同

先生是多年好友……李先生和他都在实践感化教育,的确收了效果;我从受过他们的教的人可以亲切地看出。后来李先生出了家,就是弘一师。夏先生和我说过,那时他也认真地考虑过出家。他虽然到底没有出家,可是受弘一师的感动极大,他简直信仰弘一师。自然他对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仪式上。他是热情的人,他读《爱的教育》,曾经流了好多泪。他翻译这本书,是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动笔的,从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他将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

还有匡互生,朱先生在《哀互生》一文中这样描写他:

“他不爱多说话,但常常微笑;那微笑是自然的,温暖的。在他看,人是可以互相爱着的,除了一些成见已深、不愿打开窗户说亮话的。他对这些人却有些憎恶,不肯假借一点颜色。世界上只有能憎的人才能爱;爱憎没有定见,只是毫无作为的脚色。互生觉得青年成见还少,希望最多;所以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一滴不剩而献给他们,让爱的宗教在他们中间发荣滋长,让他们都走向新世界去。互生不好发议论,只埋着头干干干,是儒家的真精神。”

互生与丐翁志趣最相投。在理想的春晖不能继续办下去的时候,丐翁转而投身于办理《中学生教育》杂志;互生则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继续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在贫病与劳累中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将生命献给立达,立达也便是他的生命”。

回过头来,看看这批具有理想主义气息的教育家,你会发现,他们大都有着非常相似的家世背景、受教育经历以及他们成长于其中的其他人文、社会和自然环境。我觉得,如果撇开十分个人化的因素,他们那份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很可能出自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化贵族的“薰习”与平民主义思潮的相互激

荡。他们很传统也很现代,很贵族也很平民,是理想主义打通了他们心灵中传统与现代、贵族与平民的隔阂。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这话不假,但要知道:历史这面镜子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固定在那里的,它需要我们去寻找甚至去创制。兴洲君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对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论思考。他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却一下子从当下回到了历史,从抽象的理论转向一所具体学校和与这所学校有关的一群特别的人,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大有深意。据我所知,此举旨在让理论回归现实,回归生成这一现实的历史和文化,并让理论接受精神的拷问和滋养。毕竟,理论是人的理论,需要人来思考、由人来落实;而人落实理论的过程,同时也是化理想为现实、追求精神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一言以蔽之,现代学校制度,是建立在历史、文化和精神追求的根基之上的。对于现代学校制度的研究者和设计者来说,有没有这种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结果大不相同。

似乎纯属巧合:在兴洲君完成博士后工作报告的同时,我指导的另一位学生继青君完成了马一孚与复性书院的博士论文。马一孚先生也是那个时代一位有信仰的教育家,与朱自清、丰子恺、夏丏尊属同一类人,相知且相交。但仔细想来,这又并非巧合,它是走出温饱阶段、奔向小康时代的中国人文化自觉、精神追求的历史投影。如今的春晖中学,有了一流的设施、一流的师资,却并不就此满足,还要通过历史回溯,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于是,理论研究者与教育工作者又有了精神上的共鸣。这意味着:一个追求有信仰的教育时代,已经开始。

于述胜

2008年9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春晖中学的创办	4
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对强国教育的渴求	4
二、陈春澜的办学兴学情结	7
三、王佐的教育人生	11
四、经亨颐的教育救国志向	12
五、春晖中学的创办过程	18
第二章 “纯正的教育”：经亨颐的教育思想	47
一、教育贵纯正	48
二、“纯正教育”之“清水”说	50
三、教育独立，哲人办教育	52
四、“爱字为教育之要诀”	54
五、纯正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56
六、纯正的教育宜“动”不宜“静”	61
七、纯正的教育是全面发展的教育	63
第三章 “爱的教育”：夏丏尊的教育理想与实践	72
一、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72
二、献身教育事业，实践爱的教育	84
三、夏丏尊对纯正教育的阐释	96

四、扎根春晖中学,功勋不可磨灭	100
五、铸造“开明之风”,泽被莘莘学子	123
第四章 “群芳园”:春晖园里的教育家群体	130
一、朱自清与有信仰的教育	130
二、丰子恺与美的教育	155
三、刘薰宇的科学教育观与学校管理思想	164
四、匡互生的感化教育与教育革新实践	175
五、春晖中学的其他教师	198
第五章 “蝶恋花”:春晖园里的游访	209
一、李叔同的春晖情	209
二、蔡元培春晖之行	211
三、吴觉农寄语春晖	217
四、俞平伯雨中演“诗”	217
五、慕名而来的其他游访者	223
第六章 春晖园里的“纯正教育”	228
一、初创时期春晖中学的管理机制	228
二、春晖中学的教师	242
三、春晖中学的教学	259
四、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274
五、春晖中学早期校徽、校训、校歌及毕业歌	282
结语	286
一、“纯正教育”的辉煌与思考	287
二、“纯正教育”的式微与反思	302
三、“纯正教育”之于今天	315
参考文献	323

引言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
知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游子吟》

教育本应是一种不受外力干扰和侵染的纯正事业，应当遵循教育本身固有的规律办教育，因材施教，因时制宜，不偏不倚，自然发展。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春晖中学“纯正的教育”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追求“纯正的教育”，是经亨颐一生的教育理想。经先生认为，纯正的教育就像清水一样，多量的清水能融化糖与盐；而纯正的教育，则能荡涤那些乏味无力的教育，积极地图谋人性的发展。经先生主张教育独立、哲人办教育，极力反对军阀政治对教育的干预和摧残。在经亨颐看来，纯正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在于追求学生的全面发展。

经亨颐和夏丏尊都认为，“爱字为教育之要诀”，教育若没有情和爱，就像无水的池，就会缺失教育的本真，最终免不了空虚。以“妈妈教师”著称的夏丏尊先生一生笃行“爱的教育”，认为教育应当以人为第一背景，“爱”是教育的灵魂，教育者要有高尚的人格，“真正的教育需完成被教育者的人格”，学生进入学校是接受教育的，而不只是接受教材的。

在经亨颐、夏丏尊“纯正的教育”思想感召下,丰子恺、朱自清、刘熏宇、刘叔琴、朱光潜、匡互生等一大批名师齐聚春晖,蔡元培、叶圣陶、吴稚晖、杨贤江、黎锦晖、黎维岳、赵蔼吴、舒新城、郭任远、陈望道、高型若、黄炎培等专家学者慕名前来春晖游学演讲。在短短的几年内,春晖中学因其先进的办学理念、因其富有关爱和善意的教育实践而名声远播,取得了与当时南开中学齐名的辉煌成就。

然而,早期春晖中学的辉煌并没能长久,1924年冬天的“毡帽事件”激起了教师和学生的公愤,一批名师如夏丏尊、丰子恺、匡互生、朱自清等相继离开春晖中学,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也尾随他们而去。遭此打击,春晖元气大伤,从此,辉煌时期的景象再也没有出现在后来的春晖中学。

春晖中学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迅速走向衰退,令人深感遗憾之余,人们不禁要追问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断送了春晖中学的辉煌?研究发现,20世纪初动荡的社会现实、军阀政治对新的教育思想和新的教育改革实践的阻挠和摧残、封建恶势力对新的教育理念的排斥和攻击,是断送春晖中学辉煌前程的主要社会背景因素。学校管理层与主力教师之间对纯正教育理解的偏差,或者说他们对纯正教育所追求的目标的不完全一致,导致了他们在办学目标和办学行为上的分歧;当这种分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分道扬镳,曾经的辉煌便不复存在。

无论如何,初创时期的春晖中学的教育实践毕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极大的成功,尽管它是短暂的,也足以令今天的人们羡慕不已。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会从中获取怎样的启示?这种启示对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改革有何借鉴意义?这应当是我们今天研究和探索当年春晖中学的办学历史的用意所在。

缅怀当年春晖中学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 教育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是无功利的纯正的事业;
2. 教育改革要体现教育的本质,追求纯正的教育;
3. 爱是纯正的教育不竭的源泉,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要传达出对学生的善意、信任和关爱。

初创时期春晖教育的辉煌已经离我们远去,当年春晖中学追求美好教育理想的失败令我们惋惜;但是,当年春晖中学所唤起的人们对美好教育梦想的追求精神永驻。春晖中学曾经的成功和辉煌,也将会给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实践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这种启示,有助于推动现实的教育回归教育的本真,展现教育的根本规律,实现教育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真正价值。

第一章 春晖中学的创办

吾国实业人才之缺乏，因平素不知所以发育而储备之。穷原竟委，当归咎于教育之不修。

——穆藕初：《藕初文录：上卷·藕初五十自述（下）》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创办春晖中学，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学校教育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创办人强烈的主观愿望和振兴民族、教育救国的社会责任感。

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对强国教育的渴求

清末以来，传统的泱泱大国备受西方列强的凌辱，加之国内此起彼伏的动荡和抗争，清朝帝国已病入膏肓，日薄西山。内忧外患，尤其是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欺凌，也催促大批民族精英冥思救国救民之道。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曲折和探索之后，推翻帝制和兴办学堂逐渐成为强国强民的主要选择。1912 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终结；然而，封建帝制的终结，并没有立即带来中华民族的强盛，尤其是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迅速强大形成巨大的反差的比较，更加坚定了国人对于兴办教育事业以强国强民的认识和信念。于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兴办教育的热潮空前高涨，教育救国思想也成为不少志士仁人的生命

理想和事业追求。这其中,教育界人士的办学理想和商业界人士的捐资办学行为,成为推动我国近代学校教育迅速发展的两大力量。

近代商人渴望祖国的富强,认为中国只有在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抵抗侵略者。然而,要实现祖国的富强,就必须发展工商业;而要振兴民族工商业就必然要有为之服务、献身的人才。著名绅商经元善之所以敢于打破几千年的沉重积习,开女学之先声,是因为在他看来兴女学是中国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学堂;而学校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女学”。^① 张謇以状元身份下海经商,抱定“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②的信念,以兴办师范教育为端始,后兼及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为我国近代实业、教育奋斗了一生。被实业界誉为“棉纱巨子”的穆藕初回顾我国实业发展的历史,也深有同感,“考我国二十年,累办实业,累招致失败之最大原因,莫不以缺乏实业人才”。而“吾国实业人才之缺乏,因平素不知所以发育而储备之。穷原竟委,当归咎于教育之不修”。^③ 到20世纪20年代,创办学校、捐资兴学、走教育救国强国之路,已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从当权者到普通民众都对发展教育事业寄予厚望。一时间,兴办学校蔚然成风。春晖中学就是其中的一例。

① 虞和平:《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

② 《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15页。

③ 穆藕初:《藕初文录:上卷·藕初五十自述(下)》,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22页。

表 1—1 1907—1949 年中小学学校发展简表

年份	小学校		中学校	
	学校数	学生数	学校数	学生数
1907	34383	921965	419	31682
1908	41264	1189059	440	36264
1909	51854	1529042	460	40468
1912	86318	2795475	500	59971
1913	107286	3485807	643	72251
1914	121081	3921727	784	82778
1915	128525	4140066	803	87929
1916	120097	3843454	653	75595
1922	177751	6601802	547	118658
1925			687	129978
1928			954	188700
1929	212385	8820777	1225	248668
1930	244618	10788582	1874	396948
1931	259034	11683826	1893	401772
1932	262498	12179994	1914	409586
1933	257498	12335967	1920	415948

(本表根据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 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2—33、133 页有关资料编制。)

表 1—2 1909 年中日学务统计对照表

类别	中国	日本	比例
人口总数	400000000	50000000	8:1
学堂数	59117	35197	1.7:1
学生数	1639641	6327158	1:3.6
学龄儿童就学率	3.7%	97.38%	1:28
平均每校学生数	28	180	1:6.4
年卒业学生数	24325	1279608	1:52.6
教员数	90095	147086	1:1.6

(资料来源:《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全国学校之状况》,《教育杂志》第 2 年第 2 期,1910 年 3 月 20 日;《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转引自桑兵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5 页。)

表 1—3 1902—1905 年中国新式教育学生数

年份	学生总数	小学生数
1902	6912	约 5000 余
1903	31428	约 20000 余
1904	99475	约 80000 余
1905	258876	约 230000 余

(资料来源:吴研因、翁之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小学教育》,《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第 26—27 页。)

二、陈春澜的办学兴学情结

(一) 商界巨擘,心系桑梓

浙东大地,虞舜遗风绵延流长,文人墨客,层出不穷。这厚重的人文历史积淀,孕育了当地人向学向善的文化品格,也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名声显赫的文化人物。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一旦变成一种大众的文化性格,其渗透力、感染力及其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不仅能惠及乡里,也能惠及整个民族。



陈春澜

春晖中学的捐资者陈春澜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颇具虞舜遗风的甬绍名人。他虽然没有高深的文采,但他深知知识文化在为人为事上的重要,即使腰缠万贯,亦念念不忘兴学教子,捐自己的勤劳所得,办学堂,建学校,心系桑梓,泽被乡里。

陈春澜(1837—1919),字文江,又名渭,浙江上虞小越镇横山村人。小越镇历史悠久,风光秀丽。据传,春秋末期,越王勾践曾在此屯兵,迄今,小越后山尚留有遗迹。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鏐在当地斩孽蛇为民除害,又将小女嫁于此,故名“小越”。历史

上,小越曾有过清明上河图般的盛况,有诗云“流水小桥石板街,长廊倚楼曲尺柜”。至今,小越仍留有磨剑井、伏龙山、潼主娘娘庙等遗迹,境内留有陈春澜故居及春晖小学堂。

陈春澜幼年家贫,无钱上学,在家务农。14岁时被其四叔带往汉口汇丰钱庄做学徒。次年钱业收缩,又失业返乡。为维持生计,即随兄搞短途贩卖,不料亏本,重回家乡务农。他清早放牛,傍晚拾狗屎,历时数载,乡人谑呼其为“狗屎阿渭”。咸丰五年,19岁的陈春澜为摆脱家境贫困,毅然去上海闯荡世面,先在一家外商开设的台维洋行当学徒,三年后,因不满洋行老板欺压愤然离去,接受了另一家淳信洋行的聘请,当“跑街”。陈春澜在淳信洋行任事14年,省衣节食,逐渐积累起自办商业的资金。

为了摆脱寄人篱下、靠吃洋饭度日的尴尬境地,于光绪元年(1875年),陈春澜在上海开办了投资较少、收益稳定、以劳务为主的上海春记货栈,注册“常胜”商标,供客户存放货物、兼营运输。经过十多年的惨淡经营,业务日益拓展,遂设分庄于天津、汉口,经营范围遍及东北、河北、湖北、江苏、浙江,成为富甲一县之巨商。51岁以后,以独资、合资形式,在上海先后开设永丰、寿丰、兆丰等11家钱庄,为绍帮钱庄之主要代表人物。

光绪二十年,陈春澜在58岁时,将货栈、钱庄交由侄、孙辈接办,返回故乡上虞。返乡之后,陈春澜见不少耕地荒芜,江湖堵塞,堤防溃败,洪灾时常泛滥,深感痛心。于是决定筹措资金,创办实业公司。乡贤王佐大加鼓励,又得到同乡举人朱鸿儒主持筹办,终获地方当局支持,于宣统三年二月七日获准成立上虞商办春泽垦牧股份有限公司。

陈春澜创办春泽公司,旨在因地制宜,开辟富国之道,为民生利。因此公司对低瘠硗涸之田地山林,合理收购,公价买入;其他